



中國銀行(香港)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百年中銀 與您同行
A CENTURY OF SERVICES, ALWAYS WITH YOU

傑出的國際金融家鄭鐵如

把畢生精力和才智獻給中國金融事業的鄭鐵如，在中國銀行工作逾四十年，是蜚聲海內外的傑出的國際金融家。中國銀行同仁親切地尊稱他為「鐵老」。

愛國知識分子的典型

鐵老字壽仁，廣東潮陽縣人，生於1887年。辛亥革命前就讀於蘇州東吳大學，後留學美國，先後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貨幣、銀行、會計和國際匯兌專業。1917年回國，曾任著名實業家張謇的秘書、北京大學教授。1921年進中國銀行工作。1927年出任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1965年底以78歲高齡退休，任職時間長達38年。1973年在香港逝世，享年86歲。

鐵老是銀行家，更是一位典型的愛國知識分子。他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人民外受侵略、內遭戰亂的危急存亡之秋。每當風雲變幻的時刻，鐵老總是以高度的愛國熱情，投身於革命洪流。辛亥革命爆發，他毅然輟學，參加了沈定一組織的學生軍。1919年，他與馬敘倫等被推為北大教職員會代表，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1932年，在中國人民反擊日本侵略軍挑起的「一·二八」事變中，他在香港籌集大量資金物資聲援十九路軍抗日。「七·七」抗戰開始，他又在香港大力推銷愛國公債支持全民抗日，成為後來日本佔領軍拘捕他的「罪證」之一。1938年，宋慶齡、何香凝在香港創辦「保衛中國大同盟」和「香港婦女慰勞會」。鐵老參加了「大同盟」工作，他的夫人謝紉瑜擔任了「慰勞會」司庫，夫婦共同為保衛祖國和為八路軍籌集捐款而盡心竭力。

1941年香港淪陷後，鐵老與梅蘭芳等愛國人士被拘於告羅士打酒店。日本佔領軍要脅鐵老出任偽職，他大義凜然，嚴辭拒絕，保持了民族氣節。解放戰爭勝利在望的時候，香港中國銀行部分員工情緒不安，要求發給遣散費自動離行。鐵老苦口婆心，諄諄勸導，終於使全體員工安下心來，堅守崗位。

鐵老熱愛祖國，熱愛中行。1950年1月，在海外中國銀行接受新中國領導，回歸祖國的過程中起到表率作用。1950年1月6日，英國正式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願意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1月9日，周恩來總理對駐港機構發佈命令，要求各機構員工「各守崗位，保護國家財產檔案，聽候接收。不讓反動分子有任何偷竊、破毀、轉移、隱匿等情事。原有員工均可量才錄用。其保護國家財產有功者，將予以獎勵，其有偷竊、破毀、轉移、隱匿等情者必予究辦。」

護產命令到達香港，金融機構中首先通電擁護的就是以鄭鐵如為經理的香港中國銀行。鄭鐵如帶頭接受新中國領導，不僅使香港中資機構的接管工作得以順利進行，也為眾多海外分行陸續回歸祖國樹立了榜樣。

「一定要有中國自己的外匯銀行」

鴉片戰爭後，外國銀行紛紛到中國設行。從1845年到1949年的104年間，來華設行的多達68家，其中有英國的滙豐銀行、德國的德華銀行、日本的正金銀行、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沙俄的道勝銀行和美國的花旗銀行等。這些銀行在中國享有種種特權，發行鈔票，操縱進出口貿易，甚至連中國貨幣的對外匯價也長期由滙豐銀行制訂公佈。鐵老在任北大教授時，認識到中國要改變這一情況，一定要有自己的外匯銀行，並願意為此作出自己的貢獻。當他的意向為當時中國銀行副總裁張嘉璈知道後，就請他到中國銀行工作。

1921年7月，愛國情深的鐵老，辭去北大教授職務，擔任中國銀行汕頭支行行長。從此，他幾年如一日，腳踏實地，為把中國銀行發展成為中國的外匯專業銀行而貢獻了畢生的精力和才智。在汕頭支行工作期間，他不僅開拓了中國銀行業務，也為當地金融管理方面做了一些興利除弊的事。在鐵老的建議和多方活動下，終於廢除了七兌票。1927年1月，鐵老從汕頭支行調任漢口分行副行長，同年7月，升任香港分行行長。從此，他就把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簡稱「港中行」）作為開展國際金融事業的基地，他的名字幾乎就是港中行的同義詞。

經過鐵老從1927年到1950年初接受新中國領導的二十多年的經營，港中行職工從26人增加到90多人，積存的自有資金高達6,000多萬港元，成為中國銀行開展國際金融業務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分行。巨額外匯資金引起了台灣當局的覬覦。蔣介石親自主持會議，決定派出以俞鴻鈞為首的秘密代表團到港，向港中行的主管人員進行游說拉攏，企圖利誘一些人連人帶資投奔台灣。當時，鐵老對港中行的大量資金早已作了安排，以一半資金購置了蓋大樓的地皮、建材和設備，連出租給客戶的保險箱都以現金辦妥訂貨手續；以大部分資金貸放給香港紡織工業和其他工廠。這些措施都是為了防止台灣當局的劫奪。為了拒絕台灣當局的游說和預防暴力劫奪，鐵老稱病住進醫院，拒不見客，以示決絕，終於為新中國保住了一筆可觀的外匯資金。

鐵老在開展港中行業務時，積極提倡國貨運動，並以大量資金支持在港的民族工業。1947年，他同時擔任廣州、香港兩地的中國國貨聯合營業公司的董事長。在聯營公司結束後，由鐵老擔任董事長的香港中國國貨公司不僅繼續營業，而且有了很大發展。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在香港百貨業中，仍佔一定地位。幾家國貨公司成為一些離國去鄉幾十年的海外老華僑踏進國門之前得先觀看流連一番的地方。在提倡國貨的同時，鐵老對來自內地的民族工業，特別是來自上海的紗廠，在資金上給予了巨大支持。鐵老對於紡織工業在香港發展的前景，從經濟上、生產技術上、銷售市場和政治環境等方面進行了細緻的分析研究，最後才決定給予貸款。

外匯業務奇才

鐵老不僅是一位傑出的國際金融專家，而且是外匯業務的行家裡手。他在擔任港中行經理期間，運用豐富的經驗，以及對國際形勢的深邃洞察，外匯交易上獲利頗豐。以下是兩個具有代表意義的事例。

香港淪陷後，日本侵略軍強迫港中行開門複業。鐵老對日軍說，複業就得支付存款，我們沒有錢支付。日軍說，沒有錢可以借給你們。你們有抵押品嗎？鐵老就把一位客戶逾期沒有贖回的房地產做抵押，向日本正金銀行借到軍票200萬元，但存戶大多已去外地，軍票不能用來支付存款，日軍就按

1元軍票合4元港幣的比率，付給中行800萬港元。到日本投降前夕，市面上軍票不斷貶值，1元港幣已可換到5元多軍票。鐵老抓住時機，同香港中國國貨公司（鐵老是該公司董事長）商量，賣掉公司的一部分貨物，將所得軍票借給港中行還債，中行則按軍票4元折換港幣1元的比率歸還國貨公司所借給的軍票。這樣就只用幾十萬元港幣還清了正金銀行200萬元軍票的債務，淨賺了700多萬港幣。鐵老後來笑著對人說，我們大廈的地皮可說是日本人付的錢。

作為一個外匯業務專家，鐵老養成了按時收聽重要廣播的好習慣。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有一天他收聽倫敦廣播時，聽到英國財政大臣宣佈，如果大戰不能避免，政府將徵收私人持有的外匯和美國股票。鐵老憑藉其多年積累的外匯市場經驗，立即意識到大戰爆發已似箭在弦，如果英國徵收私人外匯，英鎊勢必暴跌，美元勢必狂升，很可能從1英鎊折4.6美元跌到折4美元以下。他立即打電報到紐約拋出英鎊，又在倫敦和香港買進了300多萬美元。結果在他買進美元沒幾天，英國果真宣佈徵收私人外匯，於是英鎊一下子跌到每英鎊合3.6美元。那些賣出大量美元的銀行經理到那時才明白中國銀行大量買進美元的原因。在這次外匯買賣中，鐵老替中行賺到了蓋新廈所需的大部分資金—700多萬港元。

鐵老能夠很好地保全資金不受損失，在於他具有敏銳的政治頭腦，善於從政局變幻中窺測到外匯市場的動向。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鐵老看出日本軍閥的狼子野心，為安全計，他把港中行全部資金調存英美兩國。由於事前採取了防範措施，香港淪陷後，港中行資金未受絲毫損失。抗美援朝戰爭伊始，為防範美方凍結港中行在美資金，他及時將存放在美國代理行的存款餘額壓縮到最低限度，使港中行後來被凍結的資金只有5萬多美元。這是鐵老善於根據國際政治形勢變化處理業務的又一例子。

鐵老還善於從經濟形勢變化來窺測政治動向。曾經有過這樣一件事，在美國還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的時候，有一位英商向港中行開立一份從澳大利亞進口麵粉到中國的信用證，數量很大。鐵老從中分析出，這些麵粉是美國通過澳大利亞轉口輸入中國的。當時麵粉是禁運物資，既然美國允許大量麵粉轉口輸入中國，說明美國在處理中美關係方面可能有新動向，於是他寫了報告送內地參考。後來鐵老到北京見到周恩來總理問起此事，周總理指示有關部門查閱檔案後認為，鐵老分析正確，對鐵老備加贊許，同時要求有關部門好好學習鐵老，要善於從一般業務中發現內在的更為重要的東西。

鐵骨錚錚 急公好義

鐵老人如其名，生來一副錚錚鐵骨，一身都是正氣。他剛正不阿，不畏強權和暴力。不管你官有多大，也不管你是中國人、外國人，只要你錯了，他就敢於批評反對。上世紀40年代末，當香港中行在德輔道購地建樓時，有機構要求對港中行新建大樓高度作出限制，並以港英政府工務司將不予批准施工相要脅。鐵老據理力爭，最後由港督出面「調處」，以可以略高幾尺而結束糾紛。抗美援朝期間，在港督主持歡迎美國第七艦隊司令的宴會上，鐵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義正詞嚴地闡述了朝鮮戰爭的性質和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正義性。

抗日戰爭期間，鐵老領導的港中行發揮長期為愛國華僑提供匯款服務的網絡優勢，將海外僑胞的捐贈物資及時轉交國民政府或八路軍，受到時為八路軍代表的周恩來、葉劍英等聯名致函表揚。港中行接受新中國領導後，鐵老更受到周恩來總理的知遇和信任。在處理港中行和海外其他分行的一些重要問題時，周總理經常徵求鐵老意見，鐵老總是坦率陳言，受到周總理的重視和嘉許。

鐵老錚錚鐵骨、堅持原則的崇高品德，在中國銀行和香港金融界可以說是聞名遐邇、有口皆碑。同時，他對同行、好友遇到的困難，總是急公好義，全力相助，樂於替人排憂解難。香港某華資銀行老闆是鐵老至交，在一次金融風潮中為擠提存款所困。鐵老毫不猶豫地每天下午親到該銀行營業廳坐鎮一個小時，以他的聲望和信譽終於平息謠言，使該銀行擺脫了困境。

新中國成立前，內地銀行業設在香港的十多家分支行競爭激烈。新中國成立後，關係有了很大變化，親如一家。1951年底，港中行大樓落成。當時港中行員工不足百人，需用面積不多，而有些中資兄弟行和內地駐港機構卻為沒有適當的辦公地方而發愁。鐵老急人之所急，將大樓的很大部分租給相關保險公司、貿易公司和航運公司等，既解決了兄弟單位的困難，又使大廈出現一片興旺景象，成為祖國在香港的一個重要立足點，成為祖國欣欣向榮和團結強大的象徵。

更令人感動的是，浙江興業銀行香港分行由於辦公樓租期屆滿，而新的辦公樓尚未辦妥租賃手續，面臨關門停業的危險。在這危急時刻，鐵老毅然伸出援手，把港中行營業大廳的四分之一和部分閣樓讓給浙江興業銀行當營業場所，在境外開創了一個大堂有兩家銀行同時營業的特例。鐵老急公好義和樂於助人的事蹟，在銀行界傳頌不已。

(載於《大公報》)